

《金石学在陕西·追金篇》展览内容介绍与方案说明

本次展览以“金石学在陕西”为总主题，首先推出上篇“追金”，聚焦陕西地区自商周至清代民国的青铜器遗存，系统梳理金石学的学术脉络、历史价值与当代传承。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金）与碑刻（石）上的文字为研究对象，用以证经补史、考订礼制、鉴赏艺术。陕西作为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和礼乐文明的渊薮，拥有极为丰富的青铜器资源：据《陕西金文集成》统计，全省有铭铜器超过一千八百件，其中铭文逾百字者多达九十余件，数量与质量均居全国前列。正是这一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使陕西成为金石学的发源与兴盛之地——从汉代张敞释读美阳鼎铭，到宋代蓝田吕大临编纂《考古图》，再到清代全形拓技术的成熟，金石学在陕西绵延不绝。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两百余件，其中近百分之九十为首次公开展出，旨在通过文物实证与学术叙事的双线并进，呈现一部跨越三千年的金石文化史。

展览按照历史演变与学术发展的逻辑分为五个单元，另有尾厅收束全篇。第一单元“吉金渊薮”集中展示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分为窖藏与墓葬两个板块。窖藏部分选取了城洋青铜器群、陕北商代青铜器、岐山京当礼村窖藏、岐山董家村窖藏、长安张家坡窖藏等重要发现。其中城固、洋县出土的兽面纹甗、涡纹盘等器物，展现出商代陕南地区与中原、川西、长江中游多种文化交融的面貌；绥德、清涧出土的天鼎、弦纹鬲、兽面纹觚则反映了陕北商代青铜器与殷商文化及北方草原文化的联系。岐山董家村窖藏一九七五年出土三十七件铜器，其中五祀卫鼎内壁铸铭文二百零七字，详细记录了一宗土地交易与诉讼过程，是研究西周法律与经济的珍贵史料；同出的此簋八件，器内底铸铭文一百一十二字。长安张家坡窖藏一九六一年出土五十三件铜器，包括孟簋、伯喜簋、伯梁父簋等有铭器三十二件，体现了西周中期国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墓葬部分选取了泾阳高家堡戈国墓葬、扶风刘家村西周墓等。高家堡墓地出土的戈父戊盃、戈网卣、戈父己爵等器物带有“戈”字族徽，葬俗保留殷人腰坑殉狗之风；扶风刘家村西周早期墓葬共出铜器十七件，计有鼎、鬲、鬲、簋、尊、卣、爵、觯、壶等，其中八件铸有铭文，完整呈现了西周早期贵族墓的礼器组合。通过这一单元的展示，观众可以直观理解陕西何以成为金石学研究的资源宝库。

第二单元“礼乐重光”将视角转向汉代至元代，展现在此漫长时期中，后人如何收藏、仿制和使用商周青铜器，以及复古礼制如何持续影响历代王朝。汉代已有私人收藏古铜器的实例：一九八二年西安东郊三殿村汉墓出土了西周晚期的录盃三件和春秋晚期的蟠螭纹钟两件，墓主人王许的银质龟钮印证实了其姓名，这些古器被特意置于棺椁两侧，说明西汉时期地下出土的商周铜器已受到珍视。文献记载，汉宣帝时美阳（今扶风法门镇）出土一件铜鼎，京兆尹张敞释读铭文，指出其形制不宜入藏宗庙，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金文考释实例。新莽时期，王莽依据《周礼》托古改制，西安市北郊张家堡新莽墓M一一五出土了一套五件铜鼎与四件釉陶鼎组成的列鼎，形制相同、大小相近，纹饰模仿西周窃曲纹，为复古制度进入国家礼制实践提供了确切的考古证据。唐代的铜器收藏同样耐人寻味：一九七一年礼泉泔河坝一处唐代寺院遗址中出土了商代晚期的乳钉纹鼎、兽面纹鼎和乳钉纹簋，表明唐人发掘出商代遗存后将古铜器收藏于佛寺；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鸿雁纹银匜则延续了周代“奉匜沃盥”的礼仪，材质虽变为贵金属，礼制内核却一脉相承。宋代陕西更是金石学研究的重镇，蓝田吕氏家族墓二〇〇六年出土了西周乳钉纹簋、春秋鱼虎纹带盖鼎以及宋代的螺盞、素面歙砚、螺钿白围棋子等文物，这些实物直接关联着吕大临——中国最早系统的古器物图录《考古图》的作者，也折射出北宋文人雅士“观其器、诵其言、以追三代之遗风”的学术追求。元代关中则有制陶名家“寄窑老人”，西安南郊陆家寨村元墓出土的多件带有“寄窑老人”铭款的仿古黑陶高足豆、方形陶仓、黑陶方瓶等器物，反映出蒙元统治阶层通过接纳中原礼器制度来构建社会秩序与文化认同的政治策略。本单元以大量考古实例证明：金石学并非宋人凭空开创，而是历经汉、唐、宋、元各代的收藏、考释与礼制实践，逐渐积淀而成的学术传统。

第三单元“楮墨传古”聚焦于全形拓技艺及其在金石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全形拓是清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传拓技术，通过墨色浓淡和线条虚实，在二维纸面上呈现出青铜器立体形状与光影质感，被誉为“照相术出现前最逼真的器物复制方法”。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五十余件全形拓本，其中十四件带有学者题跋，涵盖清代吴大澂、韩惠洵及民国郭沫若、傅斯年等重要人物。展览中将实物与拓本对照展出，例如函皇父鼎、函皇父盘、函皇父簋等西周重器与相应的全形拓本六条幅并置，使观众直观感受拓工的精准与技艺的高超。带题跋的拓本

更具学术价值：韩惠洵全形拓四条屏、邕鼎全形拓本、大孟鼎全形拓本、太保玉戈全形拓本等，不仅记录了器物的形制和铭文，更在题跋中呈现了清代至民国金石学家的考证成果与交游网络。

第四单元“文脉延芳”转向明清时期仿古铜器及其生活美学功能。明清两代，随着金石学的进一步普及，仿制商周青铜器成为风尚。这些仿古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致敬三代”，严格模仿《考古图》《博古图》著录的器型与纹饰，如兽面纹觚、夔龙纹鼎、提梁卣、蕉叶纹觚等，体现出对三代礼乐文明的追慕；另一类是“格古创新”，在仿古基础上融入时人审美与实用需求，如万寿鼎、海水异兽纹方鼎、凤耳四兽足香炉等，既保留了古意，又增添了吉祥纹样与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这些铜器不再仅仅是庙堂祭器或墓葬明器，而走进了文人的书斋与厅堂，成为焚香、插花、陈设的雅器。展览与陕西省插花协会合作，复原了“铜盘贮花”与“铜瓶生春”两类古典花艺场景：前者源于南北朝佛教供养，唐代宫廷与寺院延续此风，以铜盘为基堆叠花团；后者在宋代文献中已有记载，如晁公溯“铜瓶添水养横枝”之句，明清时期更成为博古图中的经典意象。通过展示菱花形双鱼纹盘、清仿西周夔龙纹盘、兽面纹壶、蟠龙小口细颈瓶等器物，并结合时令花艺创作，本单元生动诠释了金石学从“格物致知”之学向“生活美学”延伸的过程，使观众理解“藏礼于器”如何转化为“以古为雅”的文人意趣。

尾厅以“文脉常新”为主题，设计为开放式书房空间，集中陈列近百种陕西学者关于青铜器与金石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著作。其中包括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续编、三编共四十三册，张天恩《陕西金文集成》十六册，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十册、《陕北出土青铜器》五册，张懋镛《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二十四册，王晖《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六册，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珠玑琳琅》《熠熠青铜 光耀四方》等多种图录与研究文集。这些著作展示了当代学人对金石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印证了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在陕西这片土地上的深度融合。观众在尾厅可以直观感受到，金石学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成为绝学，恰恰相反，它正以更系统、更科学的方法焕发新的学术生命力。

关于本次展览的特色与亮点，可概括为以下数端。其一，珍贵文物大量首展。全部两百余件展品中，近百分之九十为首次公开展出，包括大量馆藏商周青铜器、

晚期仿古器、铜器全形拓本等，许多器物长期存放于库房，此次系首次与公众见面。其二，学术文脉古今贯通。展览以“一物一史一脉”的深度叙事方式，从商周跨越至近现代，以人物为点、器物为线，串联起汉代张敞、宋代吕大临、清代吴大澂、当代吴镇烽等学者的学术贡献，生动呈现金石学发展史上不曾断裂的文脉传承。其三，道器交融、雅俗共赏。展览在注重铭文考释、礼制研究等学术内容的同时，首次将博古图与清供图中描绘的铜器插花场景还原为真实的艺术装置，通过自然花艺与古典铜器的结合，传递清雅高洁的生活情趣，使展览兼具历史的厚重感与艺术的体验感。其四，多学科协作与创新解读。展览筹办过程中，文物研究、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及花艺设计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对存疑拓本的系统辨伪、对仿古铜器的功能分析、对新莽九鼎的政治意涵阐释等，均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其五，编钟暗线的艺术化贯穿。五个单元各自设置独立展柜，依次展示西周逯钟、宋代大晟钟、明代饶益祀铜钟、清代蟠螭纹钟等，以“金石之声穿越千年”的意象统摄全展，形成听觉与视觉双重维度的呼应。

在展览的辅助说明与空间设计方面，第一单元配有《陕西出土铭文超百字青铜器统计图表》，以行政区划图标注各区域长铭铜器的分布；第二单元设有“翰墨吉光”文献摘录展板，选取《史记》《汉书》《后汉书》《太平御览》《唐阙史》等典籍中关于古铜器发现与研究的记载；第三单元将部分原器与拓本对照陈列；第四单元联合花艺协会进行定期换花与现场花道表演；尾厅的书架设计彰显金石学研究的进展。

综上，“金石学在陕西·追金篇”是一次以考古发现为基础、以学术史为骨架、以艺术与生活美学为血肉的专题展览。它既是对陕西商周青铜器家底的集中呈现，也是对金石学这一中国特有学术传统的系统梳理。通过近二百件首次亮相的文物、跨越三千年的时间纵深、严谨而不失生动的叙事语言，展览力求让观众理解：金石学不仅是学者书斋中的考据之学，更是华夏文明“金石永寿”文化精神的物质见证。